

略论“开澎进士”蔡廷兰的灾难书写

李艳萍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清朝时期的蔡廷兰,作为澎湖地区唯一的进士,具有深厚的灾难意识和乡土情怀,加之遭遇海难漂流到海外的独特体验,促使他不断探索生命的价值意义,创作出了《请急赈歌》系列赈灾诗和纪行文学作品《海南杂著》。其灾难书写用文学的方式纪录了历史,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又因其雄浑刚健、自成一体的写作风格,引发各方对灾难的书写,丰富了灾难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 蔡廷兰;灾难书写;创作动机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1)05-0500-05

On Cai Tinglan's disaster writing

LI Yanping

(Minnan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ai Tinglan, as the only successful candidate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Penghu, had a deep sense of disaster and a strong attachment to his hometown. In addition, his unique experience of being shipwrecked and drifting overseas impelled him to constantly explore the value of life. He created a series of disaster relief poems entitled “Begging for Emergency Relief” and wrote a book of travel notes *Miscellaneous Notes of the Voyage to the South of the Sea*. Its disaster writing records history in a literary way, and its historical value can never be underestimated. Because of its vigorous and self-integrated writing style, it triggers off a wave of disaster writing and enriches the creation of disaster literature. Thus, it has certain literary value.

Keywords: Cai Tinglan; disaster writing; creative motivation

蔡廷兰(1801—1859),字香祖,号秋园,澎湖人,他一生中有两次意义重大的灾难书写,一次是《请急赈歌》系列诗作对道光十一年澎湖荒灾的书写,另一次是《海南杂著》记录道光十五年他遭海难飘至越南的历险经历。道光十一年,澎湖大旱,刮大风、下咸雨,所种杂粮均枯萎而死,形成严重的盐碱灾害,造成该年冬季至次年春季的大饥荒,岛民面临死亡威胁。当时身为一介布衣的蔡廷兰情急之下写就《请急赈歌》四首上呈时任福建兴泉永道的周凯,引发周凯、蒋镛、徐必观、沈长棻等人以赈灾为主题的诗歌酬赠风潮。周凯对其

颇为赏识并加以培养,传授其读书法一卷,名之曰《香祖笔谈》,蔡廷兰因此声名远播。道光十五年蔡廷兰参加乡试返家途中遭遇台风,飘至越南,幸亏大难不死,从陆路返回澎湖,历经118天。抵家后他将遇难经历和一路见闻写成《海南杂著》一书,“自是而后,道德益坚,文章益增其气”^{[1]42},于道光二十四年晋京会试,赐进士出身,成为澎湖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进士。

两次灾难书写何以能够成就蔡廷兰的传奇人生?这和他的创作动机有密切关联:潜意识中的多次灾难体验和深厚乡土情怀驱使他写下了《请

急赈歌》等赈灾诗；经历灭顶之灾的海难促使他深度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创作出了《海南杂著》。“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2]¹¹³丰富的情感体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发之为言，能引起接受者的共鸣和认可。这种创作动机驱使蔡廷兰用史家笔法记录历史，从而使得他的灾难书写具有相应的历史价值，同时也带动了多方联动的诗歌创作，丰富了澎湖地区文学史，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价值。

一、创作动机

（一）潜意识中的灾难体验

人为时代之产物，也为环境之产物。时代际遇和自然环境对人思想观念与生活行为影响尤为深刻。澎湖乃孤悬海岛，岛民半渔半农为生，天然灾害频仍。澎湖虽非不毛之地，但地瘠民贫、土地浇薄、五谷不丰，地震、异疾接二连三。仅就记载较为详实的咸丰、同治二朝而言，澎湖在咸丰朝的十一年内有七次大灾难，在同治朝的十三年内有八次大灾难。生存环境之恶劣可见一斑，而其中又以风害、盐雨和干旱最为严重。

蔡廷兰生活的时代，澎湖历经严重灾害达十一次之多，嘉庆年间五次，道光年间三次，咸丰年间三次。多次灾难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而这种深刻的情绪体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促使创作主体寻找一种释放的媒介，形成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文学书写是一种情感表达，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大灵无梯登苍穹，叫阍不答天梦梦。开辟以来千万劫，水火疾疫与兵戎。谁言盛世无灾侵，尧水汤旱周大风。”^[3]⁴⁴孤悬海外，频遭灾害，蔡廷兰身历其境，亲眼目睹岛上灾民濒死挣扎之惨状，刺激他用文字宣泄情绪。

（二）生于斯爱于斯的乡土情怀

蔡廷兰是土生土长的澎湖本土人，“幼颖异，五岁读书倍常童，八岁能文，十三补弟子员，屡试辄冠其曹。旋食饬，名藉甚；澎之廉吏蒋镛尤爱重之”^[1]¹⁶⁴。从小就跟随父亲在书院读书，十三岁补弟子员，屡试第一，深得蒋镛欣赏。蒋镛时为澎湖通判，“慈惠爱民，尤喜栽培士类。文石书院圯，镛自为山长，以修金充工资，葺新之；与士之秀者论文，倡和若家人父子”^[1]¹³⁰。道光九年，蒋镛着手编纂《澎湖纪略续编》，打算在胡建伟《澎湖纪略》志书的基础上增补澎湖六十年变迁的历史，

“余亦邀集澎地诸生，采访事宜，共襄厥事，众皆欣然。适值秋歉，未遑竣事”，当时蔡廷兰正求学于蒋镛任山长的文石书院，和其他生员一起在澎湖本地开展过密集的民间采访工作。此续编于道光十二年完成，并经周凯评正后刊印成书。“蔡生复出澎湖续编呈览，公（周凯）披阅之下，详加评正，命余亟录刻。”^[1]¹¹⁵从《澎湖续编》各部分编写者署名情况来看，蔡廷兰独立负责编写了天文纪和艺文纪，大部分的官师纪和人物纪。

身为澎湖本土人，蔡廷兰对澎湖有着浓郁的乡土情怀。在《澎湖续编·艺文纪》前言中蔡廷兰说：“人物关乎气运，情性本于山川。文章江左，烟月扬州，韵事花场，寻幽选胜，江山之助，寄托良深。澎居东南绝岛，四方宾客，游览不到之乡；嗜奇之士，谁复过而问津？然大海波澜，中流砥柱，山光水色，春霁秋澄，与夫列屿青苍、怪石离奇，皆足以发诗人之情性、壮海外之大观。”^[1]¹¹⁵澎湖孤悬海外，少有人关注，但是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它却是钟灵毓秀的福地。尤其在协助编写《澎湖续编》的过程中，经过实地采访，对澎湖有了更全面和真实的了解，编写后期又恰逢道光十一年秋开始的荒灾，他身历其境，亲眼目睹岛上灾民濒死挣扎的惨状。面对如此惨境，蔡廷兰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叙述，而是把自己当作主体来宣泄，“薄海苍生吾赤子，繫岂澎湖一隅中？”^[3]²⁵“澎湖一岛临汪洋，西扼金、厦东台阳。干戈盗贼总无患，往往凶歉遭奇荒”。“想到此际休彷徨，吁嗟乎！读圣贤书学何事？急切难救梓与桑。遍诉当途听斯语，立法为民计久长。”^[3]⁴⁴浓郁的乡土情怀让人感到诗中呈现的不是他人的苦难，也不是其他遥远地方的不幸，而是“我们”——“我们”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恐慌，这种叙述方式更能引起读者共鸣。周凯读了蔡廷兰上呈的《请急赈歌》后，深为触动，写了《抚恤六首答蔡生廷兰》，赞赏“蔡生澎湖秀”，言其“作歌以当哭”，“悲哉蔡生言，淋浪泪满幅”，并马上“筹款拨拯济”，拯救澎湖灾民。能够产生这种效果，“盖（请）急赈歌为救民之语，字字自肺腑出”^[1]⁶⁴蔡廷兰友人林树梅在《赠澎湖蔡香祖茂才》一诗中写道：“蔡子如伤切，陈词乞赈悲。从来负忧乐，都在秀才时。”^[3]⁵³生于斯爱于斯的乡土情怀驱动蔡廷兰时刻关注澎湖，并以诗歌的形式真实书写灾难。

(三)对生命价值的探索

道光十五年,蔡廷兰遭遇海难,在海上漂流了十天,这段经历给他莫大的震撼,“念家住澎湖大海中,自幼涉沧溟,于今数十度往返,俱顺帆安稳无恐怖;间有风波,亦寻常事,未若兹之艰险备历、万死一生也”^{[1]42}。他生于海岛,自幼熟识水性,也多次在海域往返,从未想过海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此次海难,万死一生,逃过一劫之余,他开始思考生命价值这个命题:“然余闻古人以忠信涉波涛,履险阻如平地;或于惊涛骇浪间,按剑沈璧,怒骂笑谈,不动神色。彼其人皆圣贤豪杰,正直之怀,所感通天,亦不忍制其命以留为斯世用。余自问区区一介,无所短长,虽忠信愚忱亦颇自持,而际此颠危险难,胡能不怖?心怦怦然,展念老母,终焉不孝,尚敢自望生全,亦听命于天已尔。乃竟不死,以至于斯。不知天将厚造于余,而先使流落遐荒、穷愁拂郁,因以扩见闻于海外之国,未可知耶?然亦幸矣。”^{[1]42}他一方面下意识地用古人面对危难时的风范观照自身,勉励自己要有圣贤豪杰临危不惧的风度,另一方面庆幸自己得此际遇,增长了见识,“纵险阻备尝,而海岛鰕生得此旷游,亦天幸也”^{[1]42}。

顺境时往往忽略生命的存在,遇到危险时才更真切地意识到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蔡廷兰此时对生命价值这一命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初遇难时,海水进入船只,众人被吓得嚎啕大哭,蔡廷兰虽然强装镇定指挥船主“哭无益,速砍大桅”,但也是甚为焦虑,不思水米,“焦燥,思水不可得,日啖芋笋半枚,然亦竟忘饥渴”。后来大难不死,飘至越南登陆,“众方具早餐,乃大肆饱啖;负曝以坐,湿衣遽干,啼痕未涤也。急记之”^{[1]42}。历经此难,他对生死的认知和体验是前所未有的深刻,潜意识中对生命价值的思索驱使他记录了这次海难。

蔡廷兰同门师弟吕世宜曾为其画像并题词“风尘万里客,天地一诗人”,赞其“携一卷书,佩三尺剑,走万里洋,行半天下。岭岨倍尝,壮心不已,昂藏丈夫也”^{[1]309}。亲历海难,以最直接的方式体验生命的本真状态,以更积极的方式对待生命,以古人为榜样不纠结于生命的长度而是以自身的努力赋予生命更多的价值,故此蔡廷兰“自是而后,道德益坚,文章益增奇气”^{[1]42}。

二、价值分析

时代际遇和天然环境深刻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与生活行为,多次灾难体验情绪的累积、对自己生长环境的浓厚乡土情怀和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探索等因素,驱使蔡廷兰写下了《请急赈歌》系列赈灾诗和《海南杂著》。这些灾难文学作品,以真情感动读者,以真实震撼读者,而更具意义的是,这些作品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历史价值

蔡廷兰擅用史家笔法来进行文学创作,这很大程度上和他编写《澎湖续编》有关。综观他的灾难书写,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灾难发生发展的过程、赈灾的经过和成效、灾难主体的所见所闻所感等多方面情况,他的书写和史书一样真实但比史书更具体生动。

1. 荒灾诗的历史价值

关于澎湖道光十一年秋开始的荒灾,笔者通过查阅,找到两处关于此次灾难的记载:

(道光)十一年辛卯,夏旱。秋八月大风,下咸雨。冬大饥。通判蒋鏞筹捐义仓钱三千余串,先济贫民。又借碾兵米,减价平糶,复通报请恤。^{[1]164}

(道光)十一年辛卯夏,旱。秋八、九月,风灾。通判蒋鏞通报抚恤,动费银七千五百八十六两零,造册报销。^{[1]115}

澎湖乃滨海斥卤之地,土地贫瘠,不适合耕种水稻,老百姓常以地瓜、花生及海菜为食。此次遭遇旱灾,加之大风和咸雨,造成该年冬季大荒,岛上36000多老百姓面临死亡的威胁。从上引史料可看出,方志和史书对此次荒灾记载简单,详情不得而知。而蔡廷兰的《请急赈歌》四首、《巡道周公社仓之议,续成长歌一篇》《夏日喜雨呈蒋悻菴(鏞)刺史》等荒灾诗,详细地记载了此次荒灾发生发展的过程、岛民的惨状以及赈灾的联动。

《请急赈歌》四首,为五言歌行,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写作目的很明显:向当时的福建省兴泉永道道员周凯陈述灾情,呼吁赈灾。第一首从“况兹斥卤区”到“死徙无踪迹”写澎湖旱灾、风灾、盐碱灾等多重灾难,环境恶劣,百姓流离死亡。第二首以妇女的口吻完整叙述了一个具有代表性

家庭的遭遇：丈夫为逃荒灾外出谋生，不幸在外身亡，公公受不住打击也随之而亡，剩下孤儿寡母因食物匮乏也朝不保夕命将绝矣。全面叙述和个体细描，使澎湖灾情触目惊心。周凯读此诗后大为感动，回写《抚恤六首答蔡生廷兰》，并立即采取措施，联动各方赈灾。

除了详细描述灾难惨状，蔡廷兰还客观记录了整个赈灾过程：

别驾蒋公痛悲悯，心如乱发纷髻鬟。
驰书乞援赴郡城，郡城大吏动怵怵。檄
委贤能急省难，沈施赞府来经营；稽查按
验分劳役，克日编成户口册。徐公继至
亦叹嗟，率先安抚筹良策。诸君实力齐
勤民，岂等秦越视肥瘠？观察周公玉堂
英，扬帆远使观沧瀛。慈帆稳渡叱蛟鳄，
抵岸旋闻呼癸庚。视民疾苦恤民隐，长
歌一阕详民情。酸辛一字一涕泪，抚楮
长为太息声。胜披郑侠流民状，不愧次
山春陵行。公有福力能起死，变醯养瘠
缘真诚。^{[3]44}

“别驾蒋公”即当时的澎湖通判蒋镛，荒灾来临之时，他心急如焚，到处寻求援助，得到了当时凤山县令徐必观派来的部下沈长棻、施模等人的支援。之后主赈官周凯也从大海彼岸及时赶到，迅速控制灾情。

2.《海南杂著》的历史价值

《海南杂著》分为“沧溟纪险”“炎荒纪程”和“越南纪略”三部分。第一部分“沧溟纪险”，记载了蔡廷兰及其胞弟等人在海上遭遇台风漂流到越南的经过，书“大海中风雨晦冥、波涛骇异、生死不可测之情状”^{[1]42}，真实记录了海难之危险和万死一生的真实感受，乃不可多得的海难文学作品。第二部分“炎荒纪程”，以时间为序，记录了从越南返回澎湖的全过程，“述越南恭顺，雅重天朝文士，与其士大夫相唱和，及所历山川道路之险夷、城郭宫室仓廩府库市廛之虚实”^{[1]42}。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二十一日蔡廷兰从越南广义出发至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日到达厦门，历时118天，他对一路的行程作了详细的记录，如所到城市、城市之间的距离，甚至对关卡有无驻兵、驻兵人数等都有记载。试举一例：“十五日，宿枕

榔屯，自芹营屯至桃榔屯共设七处汛防，俱有屯员驻守。”^{[1]42}通过这些资料，可以绘制蔡廷兰回乡的详细路线图。第三部分“越南纪略”则是对越南历史、礼制、风俗、民情的介绍，“载越南故事，略古详今，纤悉毕具，以验其风俗”^{[1]42}。其中记载的越南历史、社会生活均为蔡廷兰亲历亲闻，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观《海南杂著》全书，对越南的历史、地理概况、礼制、衣饰、婚嫁、迎神、居住、饮食习惯、戏剧、巫术、农事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处处可见中国对越南的影响。

（二）文学价值

如前文所述，澎湖土地贫瘠，灾害频仍，孤悬海外，灾害描写更不多见，而道光十一年发生的这次荒灾，却引发多方创作热潮，留下了一百多首与之相关的诗歌，这其中最大功臣者即为蔡廷兰，如果没有他向周凯上呈《请急赈歌》，就不会有周凯的互动，也就没有其他人的诗歌往来。

看到蔡廷兰上呈的《请急赈歌》四首后，周凯既感动又意外，一连写下《抚恤六首答蔡生廷兰》。蔡廷兰四首诗详述灾情，提出赈灾建议，他大为感动，“悲哉蔡生言，淋浪泪满幅”，更令他意外的是这个小岛有如此才俊，“海外英才今见之，如君始可与言诗。志高元乾空流辈，文魄昌黎敢说师”。^{[3]51}两个素不相识之人自此开始诗文往来，蔡廷兰写了《巡道周公有社仓之议，续成长歌一篇》回应《六首答蔡生廷兰》灾情，申诉灾情，颂扬蒋镛、徐必观等地方赈灾官员，尤其赞扬周凯其人其诗：“观察周公玉堂英，扬帆远使观沧瀛。慈帆稳渡叱蛟鳄，抵岸旋闻呼癸庚。视民疾苦恤民隐，长歌一阕详民情。酸辛一字一涕泪，抚楮长为太息声。”^{[3]44}周凯又作《再赠蔡生》长诗，夸赞蔡廷兰“蔡生满腹怀琳琅，入门意气何飞扬”，并从朝廷的角度给蔡廷兰揭示赈灾政策：“蔡生听我言，我言亦孔长。国家荒政在救荒，酌济民食疗死亡，非饱尔欲充尔肠。”^{[3]51}蔡廷兰感谢周凯赈灾之举和知遇之恩，又作《再呈周观察二首》“忧世真同由己切，受恩翻悔得公迟”^{[3]54}。周凯在澎湖逗留仅一月之余，前后却写下一百多首与此灾情相关的诗歌，其门人黄荆山为之绘“澎岛赈灾”图，周凯亲笔题字：“澎湖孤悬大海中，辛卯冬，飓风为灾，明正文始达，檄予赈之。遍历诸屿，阅月乃归，得诗百有余首。”^{[4]79}如果没有蔡廷兰诗歌的感召，周凯的创作热情可能不会如此高涨。

蔡廷兰的献诗之举激发了周凯的创作热情,而周凯又带动了其他赈灾官员的诗歌创作。蒋镛作《芸皋观察莅澎抚恤,恩及官民,敬呈五律三十六韵》,充分肯定了周凯对澎湖的赈灾之功:“鸿嗷咽以奠,鹄面转为强。贫极筹加赈,恩深遍浩洋。”^{[1]115}助力澎湖赈灾的徐必观也作诗八首表彰周凯的赈灾之功绩,如“仓储十万发关中,伟绩今时富郑公”^{[1]280}。沈长棻、施模也分别写下两首七律《壬辰春捧檄来澎,随同芸皋观察查办抚恤,蒙赐书画联扇,赋诗申谢》来答谢周凯赠书画联扇之恩。

由上可知蔡廷兰对澎湖道光十一年荒灾的文学书写,促进了赈灾程序的推进,更引发了一个灾难书写高潮,丰富了澎湖的文学史。从澎湖文学史乃至台湾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蔡廷兰的灾难书写还成就了他自己。蔡廷兰以《请急赈歌》四首呈周凯,周凯大喜,不仅作《抚恤六首答蔡生廷兰》,而且颇为爱才,惜其囿于小岛见闻不广,特意亲手抄录《读书作文要诀》一卷赠给蔡廷兰,并依廷兰之名,字之为“香祖”,故命名为《香祖笔谈》,二人从此结下师生情缘。林豪在其所编写的《澎湖厅志》中评价蔡廷兰:“廷兰问业周芸皋先生之门,渊源甚正;于文工骈体,于诗尤工古体。”《请急赈歌》四首皆为古体诗,由此可见蔡廷兰善为古体,是得到周凯赏识的重要原因,被认为有韩昌黎古文之风。周凯对蔡廷兰的惜才爱才之心在其所作的《送蔡生台湾小试》中表露无疑:“海外英才今见之,如君始可与言诗。”^{[3]52}是年蔡廷兰32岁,但还是秀才身份,正苦于找不到出路,周凯对他的赏识和重视,使台郡名流如熊介臣、周涧东、姚石甫、刘次白诸公,莫不知澎湖有一位生员蔡廷兰,这不仅提振了蔡廷兰的自信心,还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更为重要的是蔡廷兰自此走出小岛,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文化圈,与当时台郡名流来往,见多识广,创作水平得以提高。

《海南杂著》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还是

一部文学价值颇高的纪行文学作品。此书篇幅不长,但一问世就引起重视,诸多名流为其作序,肯定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周凯在序言中引用苏轼的话“于山、见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仰观宫阙、见天下之壮丽”,认为蔡廷兰此次际遇,对其文学创作大有裨益,“生其游焉,还视越南蔑如也,则所以益其为文者当更无穷也”^{[1]42}。刘鸿翱更是认为《海南杂著》当可与苏轼文章相提并论,“兹记当与东坡海外文章并传,洵乎‘九死不恨、生平奇绝’之游也”“夫不履天下之奇险,不能得宇宙之壮观”^{[1]42}。熊一本则认为蔡廷兰经此遭际后“道德益坚、文章益增奇气”^{[1]42}。其海上历险描写,惊心动魄,刘鸿翱说:“吾阅其所著《沧溟纪险》,颶颶迅发于岛屿之间,潮水腾沸,浪高如山,舟桅折舵倾,沉而复起,匍匐叫号神明,以求须臾之命,不觉惊且叹,谓天何危生至此。”^{[1]42}周凯则更直接说:“余读其文而异之。”^{[1]42}

长期研究台湾历史的林衡道先生将《海南杂著》与郁永河的《裨海纪游》相提并论。他认为《裨海纪游》“描写很多当年平埔族的文化概况,被现今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视为宝典”,而《海南杂著》则“描写法国人进占越南以前的风俗习惯、气候、风土,非常详细,甚至于连当地的侨情,书内也都有记载”,因此《裨海纪游》与《海南杂著》堪称清代台湾文人的两大纪行杰作。^{[5]63}

三、结语

作为台湾澎湖地区的在地文人,蔡廷兰深受澎湖地区的环境影响,潜意识中有着深厚的灾难意识和乡土情怀,独特的体验使他创作出独具一格的灾难文学作品,引起周凯等相关名流的重视,这不仅加速了澎湖赈灾的进程,更使自身被发现和培养,从而促进了澎湖地区文学的发展,其灾难书写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 [1] 蔡廷兰. 海南杂著[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台湾文献丛刊(第42种),台北:台湾银行,1958.
- [2] 周振甫. 文心雕龙译注[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3] 陈益源,柯荣三. 蔡廷兰集[M]. 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
- [4] 龚洁. 周凯与《闽南胜》[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 [5] 林衡道. 台湾一百位名人传[M]. 台北:正中书局,2003.